

出版说明

一、本专刊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辑,并聘请专家审稿。

二、本专刊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包括国别、地区、区域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

三、本专刊主要有著作、专题论集和译稿等,并按出版时间先后统一编号。著作主要包括专业人员撰写的书稿、研究报告、博士学位论文,专题论集兼收多位研究者的合集和个人论文集,译稿以著作为主。

四、欢迎海内外学者赐稿。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专刊编辑委员会

二〇一三年 八月

序 摇 言

许征同志的专著《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政治分析》即将在复旦大学的百年校庆年出版,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和值得庆贺的事情。将近四十年前的1982年,许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当时我担任国际政治系主任,她是我亲自负责录取的学生之一。看到她在学业上不断进步,在能力上日益提高,在学术上屡有收获,特别是她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仍然顽强地坚持学习,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我自然是喜不自禁。这本专著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和补充完成的。作为她的导师,受托撰写这篇序言,我欣然同意,乐而为之。

原来,许征学习的是国际政治专业,该专业的研究重点是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她逐渐感到,不能将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与国内政治问题的研究分割开来。特别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于是,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她又攻读政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努力将国际政治研究与国内政治研究结合起来。鉴于东亚金融危机所涉及的国际和国内问题,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就成为她将国际政治研究与国内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分析的一个恰当个案。这便是许征撰写本书的学术背景和基本动因。从内容来看,本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视角新颖。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和评论曾经满布大大小小的书报杂志,许征却独辟蹊径,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的角度分析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全过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进程加速;与此同时,中国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进一步参与世界和融入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既受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又是构成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认识和不断优化全

二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就成为一个非常紧要的课题。但是,这一问题异常复杂,研究起来并非易事。本书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为问题意识和分析视角研究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既为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也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拓展了新的空间。

第二,架构合理。作者认为,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是一个多层与多维治理的过程。根据这一判断,她首先把这一过程区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认为东亚金融危机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它涉及许多政治问题,更具有深层的文化根源。其次,在每一个维度下作者又区分出国际、地区、国家和地方四个层次。东亚金融危机不是一个纯粹的地区现象,它的影响波及全球,更深入到各个国家内部。本书结合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联系的理论,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治理与善治的理论,将中国在不同维度的不同层次上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政策与过程勾画出来,展示了一幅全球化时代中国治理的整体图景。

第三,见解独到。在新颖的研究视角和合理的分析架构之下,作者对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和经验条分缕析,不时有独到见解的陈说。例如对多维多层治理理论的总结、对中国参与构建国际机制的分析、对中国推动东亚合作的研究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的概括和分析,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体现在政治内涵扩大、政治权威扩散、政治目标扩展等方面。历史上传统的大国政治或强权政治主要局限于在国内求秩序和在国外求霸权。但在全球化时代,随着政治内涵的丰富和扩大、政治权威的转移和扩散,单纯追求秩序和霸权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因此,作为战略或策略,各国的政治目标正在向综合性的安全目标、平衡性的发展目标等方面扩展和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以人类的共同利益或双边、多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和谐合作机制在全球化时代逐渐成为可能。以对话和协商争取“双赢”、“共赢”在国际社会亦日益成为共识。这些见解对于中国建设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和平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许征同志的专著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我希望这一

序 摇言 猿

评价不带感情色彩而能为读者所认同。当然,作者的研究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由于她的工作繁忙,搜集的相关资料还不全,有些提法还不是那么准确,有些论述也不是那么精炼。希望作者以后不断努力,创造出更加完善的高水准学术成果,服务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与此同时,我也真诚地期盼,复旦大学的政治学研究能够与时俱进,取得更多的成果。

王邦佐

圆年猿月猿日

目 录

序 言.....	员
导 论.....	员
一、研究的缘起.....	员
二、研究状况评析.....	源
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	员
四、研究内容概要.....	猿
第一章 东亚金融危机与中国.....	猿
第一节 东亚金融危机的背景.....	猿
第二节 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	源
第三节 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	缘
第四节 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远
第二章 经济应对与优化治理.....	远
第一节 加快与国际机制接轨.....	远
第二节 推进东亚经济与金融合作.....	苑
第三节 中国宏观调控与经济金融治理.....	愿
第四节 上海金融改革与扩大开放.....	愿
第三章 政治应对与优化治理.....	员
第一节 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员
第二节 参与构建东亚安全合作机制.....	员
第三节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员
第四节 优化地方治理.....	员
第四章 文化应对与优化治理.....	员
第一节 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	员

目 录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

摇第二节摇亚洲价值观的功与过.....	员源
摇第三节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创新.....	员园
摇第四节摇海纳百川的上海文化.....	员远
结摇论.....	员园
摇第一节摇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	员园
摇第二节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创新.....	员猿
附录一摇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大事记(员怨苑-圆园园)	圆园
附录二摇参考文献.....	圆缘

导 论

随着 1978 年以后国内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也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与此同时,外部世界的风风雨雨也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新形势下,如何把握机遇,从容应对并妥善解决各种危机的冲击已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1997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一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中国正是在从容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在经济结构、金融体制、政府行政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新的格局,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为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将在分析东亚金融危机的背景、过程和原因的基础上,具体研究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并总结全球化时代中国治理的基本经验和战略策略。

一、研究的缘起

东亚金融危机自 1997 年爆发至今已经 15 年有余。在这 15 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就中国而言,在成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之后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 WTO),成功申办 2008 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一切表明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

四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

提高。就世界而言,在全球经济低迷徘徊的同时,各地纷争迭起,战乱频仍,特别是在“9·11”恐怖事件后美国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引起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关注。几年以前的东亚金融危机似乎已经成为历史,被许多人所遗忘。

然而,如果对于大众传媒和时评专栏作家来说,这种遗忘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对于以探求国际和国内政治现象的本质为己任的政治研究学者来说,这种遗忘就意味着未能担负起自身应尽的学术责任。因为1997年的那次危机给世界、给亚洲、给中国留下的历史烙印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其后的几年中人们无时不感受到它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时是消极的,有时是积极的。因此,尽管在危机爆发初期,各类报章杂志刊载了大量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和评论,同时也有一些耸人听闻、故弄玄虚的研究著作问世,但在若干年之后再次回首,冷静、详尽和客观地分析和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正如一位亚洲事务的西方观察家所言:“关于这场危机还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并且也只有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人们才会逐渐对此危机产生更深刻的认识。”^①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王宇也有类似的感言,他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没有停止对那次危机的思考,我总觉得危机背后有一些更深的问题还没有被认识,更谈不上解决”^②。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更深入地探讨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历史曾经表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影响深远,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人们还会饶有兴趣地加以探讨,但是,一般而言,五至十年之后就應該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以获致更加明确的结论。

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叫嚣一度充斥了各类媒体和大小讲坛。但是,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有力地回击了那些

^① 斯蒂芬·维恩斯著,何纵等译:《危机年代:从经济危机到新千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12月,“作者序言”第1页。

^② 王宇,“译者后记”,参见乔治·索罗斯著,王宇译:《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第1页。

“中国威胁论”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和伊莉莎白·埃克诺米指出,在 1995—1997 年,一些美国人视中国为威胁,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下一个敌人;“但在最近的亚洲经济危机(1997—1998 年)之后,美国人又开始把中国看作负责的伙伴,可以同中国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与稳定而合作,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迅速地参与了救援泰国的一揽子计划,1998 年帮助稳定了港元。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它还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银行和企业改革”^①。他们充分地肯定了中国面对和处理东亚金融危机的负责精神。

几乎与此同时,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亦先后出笼,宣称由于中国的经济、金融体制异常混乱和脆弱,一旦面临海外金融投机的冲击,或一旦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就会不堪一击,彻底崩溃。其实,这类“中国崩溃论”并非新鲜理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1917—2008)多年以前就说过,中国是一个伪称国家的文明体,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分裂成几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原因是三种潜在的离心力量将导致这种分裂:首先是中国历史的影响,特别是 19 世纪 19 年代的军阀混战,那时地方军阀各霸一方,背叛中央政府;其次是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信仰的失败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最后是中央与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有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削弱了中央的权力,中央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其意志在地方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对此,黄亚生在其论文中已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有力的回应^②。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章家敦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在国际上和港澳台地区被炒得沸沸扬扬。他在书中煞有介事地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分析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并耸人听闻地宣称“中国即将崩溃”。他在 1998 年 1 月的一次讨论会上再次放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被迫于 2007 年完全开放金融门户,大限迫近,10 年后将崩溃。对于章家敦的预言,即便是一

^① 伊莉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华宏勋等译:《中国参与世界》,新华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 11 页。

^② 黄亚生:《解析“中国崩溃论”的神话》,《战略与管理》1998 年第 1 期,第 10—15 页。

掘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

些美国财界的知名人士也表示了明确的异议,认为“中国崩溃论”只存在于书本中,而不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经济学家杨再平等著的《中国唱不衰》更是系统清理并有力回应了“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各种“中国危险论”^①。被说成是亚洲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甚至断言:“要是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话,中国的银行系统也许已经崩溃了。”^②正是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警示作用,中国加大了银行体制改革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

这一切都表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为应对危机殚精竭虑,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政策和大量的措施。然而,中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具体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通过应对危机,可以总结哪些经验和教训?东亚金融危机究竟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几年中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充分的探讨。从政治学的视角,借鉴治理与善治理论的最新成果,运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联系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回答就是本书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二、研究状况评析

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广泛影响,自危机爆发一开始就陆续出现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过程和影响的文章和分析著作。斟酌有关文献,其论述视角可总结为“一种区分”、“两类取向”和“三个角度”。一种区分就是将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与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研究区分开来;两类取向就是将东亚金融危机作为国内问题来研究的取向与将它作为国际问题来研究的取向;三个角度就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分析和探讨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以及应对之道。

① 胡展奋、宋体金:《中国唱不衰——访著名经济学家杨再平》,《新民周刊》2000年第1000期(总第1000期),第12页。

② 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第100页。

（一）一种区分

由于东亚金融危机严格说来只发生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东北亚的韩国，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因此，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中国的学者，在探讨东亚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关系时基本上都倾向于将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与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研究区分开来。这里姑且以两本国内的研究著作为例进行一些分析。一本是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的《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①，另一本是王梦奎主编的《中国：直面金融危机》^②。

何秉孟等主编的《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学者的研究著作。与同类著述相比，它不是一本写真式、描述式或报道式的著作，而是一部深层思考和深度分析的理论专著。尽管作者试图进行相关的政策探讨，并努力使之具有决策参考价值，但是通观全书就可发现，该书除了左大培撰写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分析与对策”部分少量涉及中国问题外，全书的主体部分全部是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上篇是关于危机根源的探讨，包括“泰国：为何首遭劫难”、“印度尼西亚：沦为重灾区的多重缘由”、“马来西亚：投机者该不该负责”、“菲律宾：内因与‘龙舌兰’酒效应”。中篇是分析危机的发展，涉及“新加坡：重灾区中的轻灾国”、“台湾：新台币贬值始末”和“香港：危机中的国际金融中心”三个论题。下篇是研究危机的深化，讨论了“韩国：大财阀战略的误区”和“日本：步履蹒跚的金融改革”。很明显，此著基本没有关注中国应对危机的战略策略、政策措施，只是一本单纯分析东亚金融危机的著作。即便在少量涉及中国的第一部分，也只是在最后一节概括性地提出了我国应对危机应该采取的三条原则。

王梦奎主编的《中国：直面金融危机》是一本中国经济政策分析报告，向读者展示了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和基本

^① 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最新分析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7月。

^② 王梦奎主编：《中国：直面金融危机》，外文出版社，1998年11月。

摆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

走势。王梦奎执笔的第一章“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概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简要总结了我国应对危机的基本情况。他认为,虽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和压力,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由于我国在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中积累了经济实力和宏观管理经验,在危机爆发后应对措施得当,因而能够在这场波及全球的危机中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凸显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加强了中国在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中的地位。我国经受住了这场危机的严峻考验”^①。其余的十二章分别阐述了中国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收支调节与外汇政策、公共投资政策、农村政策、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外贸和外商投资政策、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科技和教育政策,并预测了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本书的作者都是活跃在中国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机构以及经济领导机关的专家学者,这就很自然地使得他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各项政策措施上。

(二) 两类取向

东亚金融危机从总体上来看究竟是属于国际问题还是属于国内问题,沿着这一思维路径形成了两类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取向。其一是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的国际取向,即将东亚金融危机看作国际问题,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等方面分析原因,探寻防范对策;其二是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的国内取向,即将东亚金融危机视为国内问题,从各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寻找危机的根源,研究救治之道。

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的国际取向可以在亚历山大·兰姆弗赖斯、乔治·索罗斯等人的著作中发现。兰姆弗赖斯将 1980 年到 1983 年的拉丁美洲危机、1985 年到 1988 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 年到 1998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 1998 年的俄罗斯危机统称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并认为“这四次危机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②。乔治·索罗斯

^① 王梦奎主编:《中国直面金融危机》,第 50 页。

^② 亚历山大·兰姆弗赖斯著,周凯、钟锦译:《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 6 页。

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国际金融体制自身的问题是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他分析说:“像东亚这样”如此成功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为何会在顷刻间就变得一无是处了呢?我们如果不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入手,就很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事实是,亚洲金融危机并不仅限于亚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波及了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这更强有力地说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存在于国际金融体系自身之中”^①。因此,索罗斯认为,根治金融危机的有效对策就是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建立开放社会。

与上述国际取向相对应的国内取向也有许多理论代表。其中,王自力的论文就是一例。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突发忽至,但实际上都有深层的、长期的原因和制度机理方面的因素,即反市场的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与驱动型起飞竞赛的发展战略。由于这种体制和战略的影响,所有的资源都按无制约的国家意志而不是经济效应来配置,所有的信贷都按腐败规则而不是商业规则来进行,因此,其宏观经济与产业结构必然泡沫化、畸形化,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必然偏颇失误、坏账成堆,从而危如累卵,玄机四伏。那种把危机的责任全推给外国投资者、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社会的论点,不过是失职执政者的托词^②。这样,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治本之策就是对体制和战略进行改革和调整。

(三) 三个角度

无论是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探讨,还是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分析,无论是国际问题取向,还是国内问题取向,在对东亚金融危机和中国应对危机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三个研究角度,即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探讨东亚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东亚金融危机本身是一场经济危机,因此从经济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事实上,在危机爆发以后,的确出现了大量从经济角度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在中国,早在1997年10月

^① 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第186页。

^② 王自力:《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深层次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84-185页。

同日就由《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主办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经济模式”主题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官员分别来自国家计委、体改委、财政部、证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银行、中信公司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是清一色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从1998年第1期和第2期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来看,从经济的角度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探讨占有压倒优势。例如,第1期中的论文有朱文晖、王玉清的《东亚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新格局》,秦海、李宝民的《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温铁军的《国际金融风潮与中国的“资源资本化”》,杰弗里·萨克斯的《谁来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①。第2期中的论文有朱文晖的《东亚经济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王健的《亚洲金融风暴与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黄卫平、朱敏玉的《金融危机与中国涉外经济政策——兼论中国赴东南亚收购的时机与紧迫性》,金岩石的《人民币贬值与否的政策选择及其政治后果——兼论集权政治下发展危机的形成机制》,樊纲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教训:政策、制度与危机应对》^②。在所有这些论文中,只有金岩石的文章附带讨论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政治性质^③,其余的基本上都是纯粹经济研究性质的论文。

随着对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从政治的角度反思东亚金融危机的性质和影响。王逸舟从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层面以及国家外部的国际关系层面,探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及影响,揭示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难题,考察了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由此出现的新变化。他认为,从政治学角度透视,亚洲金融危机也是一种政治危机,或者说,是全球化条件下对国家

① 《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第124-126页。

② 《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第124-126页。

③ 金岩石认为,东亚金融危机除了是经济危机、信用危机、制度危机、信心危机之外,也具有政治危机的性质。他说:“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成为唯一选择的时候,这种援助便成了政治干预或经济侵略的同义词。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从来都要‘监管’,例如菲律宾的监管是以1997年法律的形式展开的,其中包括1997年经济改革、1997年社会改革,还有政治、司法、选举制度的改革。改革虽然未必是坏事,但由外来势力强加的改革永远都是政治危机的开始。”金岩石:《人民币贬值与否的政策选择及其政治后果——兼论集权政治下发展危机的形成机制》,《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第124-126页。

的政治战略、政府的应变能力和政治家的智谋胆识的一种严峻考验。因此，“纯粹经济的甚或金融货币的因素是次要的，而社会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才是解决问题的枢纽”^①。日本的著名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高原明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应对政策和措施进行了分析，着重讨论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特别是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加强经济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强化金融监管力度等方面的问题。他最后总结道：“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的加深，国际经济与外交的联动加强了，外交重要性的上升又强化了外交与内政的联系。”^②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斯特法尼·劳塔德（Stéphane Lévesque）甚至直截了当地将亚洲金融危机看作一场政治危机，认为“亚洲危机在中国的真正性质与其说是经济的不如说是政治的。结果，它对包括北京在内的亚洲体制的全面转型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

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循序渐进，层层深入，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一般倾向。当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挖掘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时，一些学者就把目光投向了文化层面，开始注重对东亚金融危机进行文化反思。顾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他说：“泡沫经济、裙带关系和政治腐败构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而其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东亚文化的某些落后的传统。”^④东亚文化是团体导向的文化，不同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文化。东亚企业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东亚团体导向文化的一个缩影。一般而言，团体导向的文化不大强调个人权利，不大重视个人的创造性、选择自由和政治民主权利，在社会政治文化和法治环境方面也缺乏公正性和透明度，因而容易在团体价值的掩盖下滋长

① 王逸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国际关系——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种透视》，《学习与探索》（哈尔滨）1998年第3期，第28-37页。

② 高原明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以中国为例》（日文），《亚洲研究》（东京）第29卷第4号，1998年11月，第28-37页。

③ 斯特法尼·劳塔德：“亚洲金融危机：一场政治危机”，载《亚洲研究》（东京）第29卷第4号，1998年11月，第38-47页。

④ 顾肃：《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45-50页。

摆回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

官员权力的膨胀和政治腐败。东亚文化中的团体导向发展成为裙带关系资本主义,东亚金融危机正是裙带关系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明显信号。德怀特·珀金斯、白鲁恂在探讨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根源时,也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东亚经济政治发展中的裙带关系等问题^①。

上述各种研究按不同领域、以不同取向、从不同角度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影响以及应对之道、防范之策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我们加深理解、提高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同时,它们也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发现,对于从政治学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来说,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时至今日,并没有相关的论著对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探讨。以往的研究一般都倾向于将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探讨与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探讨区分开来,其中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均占有绝对优势,而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即便在现有的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许多一般性的研究中,也存在诸如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指导、缺乏综合的系统分析、缺乏实证的支持等多方面的问题。

因此,本项研究的目标就是以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为研究对象,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联系的理论框架下,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治理的经验和规律。这项研究将结合对东亚金融危机本身的研究与对中国应对危机的过程的研究,综合东亚金融危机研究中的国内问题取向与国际问题取向,整合东亚金融危机研究中的经济分析角度、政治分析角度和文化分析角度,开拓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新领域,展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

^① 德怀特·珀金斯:《法律、家族联系及亚洲经商方式》、卢西恩·派伊(白鲁恂):《“亚洲价值观”——从狄拉莫(迪拉莫)到多米诺(多米诺)》,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斯主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45-146页。

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一方面给中国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探索全球化时代中国治理的规律、积累经验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应该是探索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的一个绝佳实例。下面将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治理进行一些理论分析,以便为我们建立关于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危机的个案研究的分析框架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 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全球化的涵义格外繁杂。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内,全球化的内涵就大异其趣^①,即使在同行专家之间,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评价也存在众多的差异^②,尽管如此,关于全球化的一些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人们还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

一般而言,全球化是指人员、资本、商品、信息等的跨国界、跨洲界的流动、联系和影响的增强。在全球化的学者中,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全球化定义以阿兰·鲁格曼为代表,他认为,“全球化可以定义为: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③。安东尼·吉登斯则认为,“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全球化现象是一个错误,“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④。很明显,这是一种广义的全球化。要在各种各样的定义之中判断何者最为正确是非常困难的,这里将使用超越纯粹经济学理解的广义全球化概念。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等人就是广义全球化概念的倡导者和使用者。

①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② 阿兰·鲁格曼著,常志霄等译:《全球化的终结》,三联书店,1997年,第102-104页。

③ 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第29页。

④ 安东尼·吉登斯著,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页。